

毒药、假药、良药：

论《托诺邦盖》中的理性意志与伦理选择

王晓惠 (Wang Xiaohui)¹, 张佳音 (Zhang Jiayin)², 邢瑞桐 (Xing Ruitong)³

摘要：《托诺邦盖》借助叔侄二人制售假药的故事为读者生动地呈现出一张资本社会的伦理关系网，小说影射出作者对资本社会道德伦理关系的忧思和不安。庞德雷沃的无理性不是医治英国社会痼疾的解药，而是毒药；乔治的假理性对于病态的伦理制度来说，无疑是一剂假药。建立一种消除特定阶级利益、服务于全人类的理性道德和善性伦理制度，才是医治英国的病入膏肓的伦理制度的良药。威尔斯想找寻的良药其实是人类社会亟需构建的理性伦理价值体系，从而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要求。小说折射出威尔斯穷其一生为人类寻找解药时所经历的“拒绝毒药、防范假药、寻求良药”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托诺邦盖》；自由意志；非理性意志；理性；伦理选择

Title: Poison, Fake Medicine, Good Medicine: The Rational Will and Ethical Choice of *Tono-Bungay*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the story of uncle and nephew making and selling fake medicine, *Tono-Bungay* vividly presents an ethical network of capital society for readers, and the novel alludes to the author's anxiety and unease about the moral and ethical problems of capital society. Ponderevo's irrationality was not an antidote to the ills of English society, but a poison; George's false rationality is undoubtedly a false medicine for the sick ethical system. To establish an ethical system of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kindness that may eliminate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icular class and serve the whole human race is the good medicine to cure the diseased ethical system in England. The medicine Wells was looking for was the rational ethical value system that human society needed to build, so that it could adapt to the complex requirements of modern society. The novel reflects Wells' mental course of "refusing poison, guarding against fake medicine and seeking good medicine" when he spent his whole life searching for a c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Tono-Bungay*; Free will; Irrational will; Reason; Ethical choose

引言

¹ 王晓惠 (Wang Xiaohui), 广西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文学伦理学批评。电邮: athena_hui@163.com。

² 张佳音 (Zhang Jiayin) (通讯作者),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实践研究。电邮: zhangjiy2021618@163.com。

³ 邢瑞桐 (Xing Ruitong),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电邮: Dianaxrt@163.com。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被誉为“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美国科幻小说家 Gunn（2008, p. 214）曾评价“初期科幻小说家获得的大部分成就，以及当时科学、社会的变革因素”似乎都体现在威尔斯这位“敏锐而瘦弱的英国人身上”。英国文学评论家 Allen（1958, p. 376-377）曾说：“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至今仍无人企及”。威尔斯在科幻小说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似乎掩盖了他在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上的光芒，但作为与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贝内特（Arnold Bennet）齐名的“20世纪初英国小说界的现实主义三杰”，威尔斯在现实主义小说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小觑。威尔斯尤其擅长以科学想象和写实批判相结合的方式来凸显自己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我国著名学者侯维瑞（1986, p. 80）将威尔斯称为“英国现实主义传统在世纪初的一个重要继承人”。詹姆斯（Henry James）曾赞扬“威尔斯是继承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传统的，写社会题材和社会喜剧的一位大师”（王守仁，2006, p. 56）。Masterman（1960, p. 181）认为威尔斯通过塑造社会小说的小人物形象，“揭示了一个动荡的世界中一段零碎的经历”。

作为威尔斯社会小说的力作，《托诺邦盖》曾一度被喻为“威尔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史锦绣，2007, p. 225），它是 Ford（1965, p. 29）所肯定的“一部伟大的作品”，是 Lawrence（1962, p. 51）“读过的最优秀的小小说”。Lodge（1970, p. 228）通过详实的文本分析力证这部作品具有“时代性”特征。学者刘赛雄与胡强（2017）则认为，读者透过《托诺邦盖》可以感受到威尔斯对英国传统的地域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质疑，体会出威氏对英国社会的精神共同体命运的担忧。（p. 168）

目前中外学界主要从创作手法、思想内涵、意象象征以及生态危机等角度挖掘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极少有人挖掘小说本身蕴含的伦理深意。《托诺邦盖》借助叔叔庞德雷沃和侄子乔治制售假药的故事为读者生动真实地呈现出一张资本社会的伦理关系网，折射出作者对资本社会伦理关系的忧思和不安。本文将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指导之下，以毒药、假药、良药为三个关键词，深度发掘该作品的伦理哲思与伦理价值，丰富该作品的研究成果。

一、毒药：庞德雷沃的无理性

《托诺邦盖》描写的爱德华时代既承续着英国历史一个伟大辉煌的时代结束，也标志着一个历史新纪元的开端，具有明显的社会转型特征。（胡强，2015, p. 1）那时的英国传统社会结构正处于分崩离析之际，陷入水深火热中的英国民众虽然上下求索生存之道和治国之本，但无奈爱德华时代再无可能续写维多利亚时期的辉煌和繁荣。那时的社会不仅到处是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同时还有满目疮痍、腐败堕落。社会伦理秩序的病态混乱和伦理制度的曲直不分，为一些想要通过不法手段实现一夜暴富的人提供了贪梦滋生的温床和实现的捷径，而庞德雷沃的发家史堪称是这一捷径的典型代表。庞德雷沃不懂药理却制售假药、敛财无数，最后落得身败名裂、郁郁而终的下场。他的行为是在其无理性状态下产生的非理性意志的支配下做出的，这种无理性状态不仅存在于庞德雷沃身上，也存在于英国绝大多数民众身上。这种无理性是在病态伦理秩序中滋生的，它又反过来戕害伦理秩序，这对本就罹患重病的伦理秩序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而病入膏肓的伦理秩序又会培育出更多无理性的人。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如若任其发展下去而不加遏制，就如同用毒药医治痼疾，其后果不堪设想。

庞德雷沃的人生悲剧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究其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他的无理性。他的无理性表现在他对于金钱的狂热迷恋与病态渴求上面，而这种狂热和渴望的背后就是疯狂的自由意志在作祟。自由意志是人的一种意志，是“人的不受约束的意志（*natural will*）”（聂珍钊，2014, p. 282），比如人饿了就想吃东西，渴了就想喝水，困了就想睡觉。自由意志是人的欲望和“直觉的表现形式，其主要特点是人的活动不受某种固定的逻辑规则的约束”（聂珍钊，2014, p. 282），是人出于本能自然而然产生的想法和欲望。自由意志不涉及到社会的伦理层面，因为它仅仅是人的一种想法，并没有付诸行动，因此也不会对别人造成影响和伤害，更不会扰乱社会的伦理秩序。

庞德雷沃对金钱极度渴望，他极力想变成有钱人。这个自由意志本来无可厚非，毕竟拥有财富是大多数人的追求，甚至有些人的财富积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然而，庞德雷沃实现暴富的方式是借助坑蒙拐骗的手段妄想构建自己的商业帝国。起先他想要垄断一种叫奎宁的药物，但没有成功；随即他又将全部身家投入股市，甚至还不惜挪用乔治母亲临终托他代为保管的属于乔治的钱财，最后又赔了个倾家荡产。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挫越勇，开始着手制售假药——托诺邦盖。由此可见，庞德雷沃对财富的迷恋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他认为“用最贵的瓶子兜售最贱的东西”（Wells, 2002, p. 148）才能帮助他实现暴富的美梦。“最贱”指药品质量低劣，而非药品价格低廉；“最贵”是指价格高昂，而非质量上乘。药品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必需品，然而在庞德雷沃眼中，药品不过是他敛财的工具。庞德雷沃的做法是他自由意志的真实表现。非理性意志指“一切感情和行动的非理性驱动力”（聂珍钊，2014, p. 251）。自由意志在转变为非理性意志之前，还要经过理性的限制和管束过程。理性（*rationality*）是“人在特定环境中的正确认知和价值判断，是人拥有的使自己区别于兽的美德”（聂珍钊，2014, p. 252）。理性是根据特定伦理环境中伦理秩序的规约，对自己的身份和行为做出符合伦理规约或趋于善的认知和判断。理性的三要素是“认知、价值判断和道德行为”（聂珍钊，2014, p. 252）。这三个要素是从低到高的三个档次，“认知”不牵涉道德的约束，但“价值判断”和“道德行为”要受到伦理价值和道德标准的判断和管制。“道德行为是理性的载体，理性是道德行为的属性，善恶是理性的标准”（聂珍钊，2014, p. 253）。只有三个要素同时具备，人才算是理性的人，道德的人。而一个人的理性如果仅仅处于最低层的“认知”阶段，他就称不上是理性的人，道德的人。

显然，庞德雷沃的理性只处于最低层的“认知”阶段，他只能根据当时伦理环境对他的自由意志做出不涉及道德的认知和判断。在有限的“认知”范围内，他认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最佳方式就是兜售假药，因为假药可以帮助自己迅速牟取暴利，这种认知没有趋于道德的理性约束，庞德雷沃的自由意志直接转化为非理性意志，引导他肆无忌惮地卖假药。至于消费者吃假药后有什么不良后果、甚至危及生命，根本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而是智商问题，自己无需承担后果，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道德。

理性是人们根据伦理环境和伦理秩序做出的认知和判断，因此特定的伦理环境对理性的形成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庞德雷沃的低层次理性是当时伦理环境和伦理秩序的产物，因此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聂珍钊，2014, p. 7），归因他理性的形成。在庞德雷沃的认知里，贩卖假药是完全符合自己利益并符合伦理秩序的理性判断，他认为：

这种事人人都在做。不管怎么说，这东西没什么害处——或许还有好处。说不定有很多好处——比如说，给人以信心，预防流行病。懂吗？为什么不懂呢？我倒是搞不懂你所谓的骗局从何说起。（Wells, 2002, p. 144）

庞德雷沃的理性告诉他卖假药是顺应伦理秩序的行为，当时的伦理环境中几乎每个人都在卖假药，伦理环境和伦理秩序允许兜售假药的行为。

庞德雷沃低层次的理性几乎等同于无理性，而这种无理性正是当时英国社会痼疾的写照。19 世纪晚期的英国社会，伦理秩序笼罩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云翳之下，呈现颓废、堕落、无序和失范的特征。非正常的伦理秩序滋生出非理性的人。正常的伦理秩序会对个体的非理性行为起到引导、约束的作用，会与法律一道对破坏伦理秩序的个体施以惩罚和制裁。然而婶婶的一句话在英国“就没有禁止出售假药的法律”（Wells, 2002, p. 156）告诉我们，当时的伦理制度允许假药交易存在，人们享有售卖假药的自由。非正常的社会伦理对卖假药行为没有伦理层面的谴责和法律层面的惩罚，反而摆出一副支持和赞成的姿态。就是这种自由主义泛滥的非正常伦理制度催生出庞德雷沃的无理性，以及千千万万像庞德雷沃一样无理性的人。就像庞德雷沃说的那样：

登广告做大买卖的哪一个不是吹得天花乱坠，卖的却是大路货。瞧瞧奇克逊——他们给他封了个从男爵。看看拉德莫尔勋爵，他到处瞎吹强碱肥皂发了迹！天花乱坠的广告正是他做的！（Wells, 2002, p. 144）

就算卖假药被允许，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购买呢？天价假药，毫无效果，甚至危害健康，难道购买者都是傻子吗？这也和当时盛行虚荣消费主义的伦理环境分不开。庞德雷沃夫妇发现：

在最近二十年里，下榻宾馆和光顾酒店的常客的人数增长得太离谱了……而且还因为这类腰缠万贯的人……不喝晚茶改吃正餐，开始热衷于晚礼服。（Wells, 2002, p. 266）

寥寥数言，虚荣消费奇态丑态跃然纸上。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不断膨胀，虚荣消费者购买的不是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商品，而是象征富人身份地位的无形资产。“金融新贵为了摆脱往日的穷酸面貌往往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Bell, 1989, p. 36）。这些人被扭曲成消费机器，彻底沦为消费主义的奴隶。托诺邦盖被粉饰成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和标志，购买托诺邦盖就是证明自己经济实力雄厚、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最直接的方式。

一方愿意售卖，一方愿意购买，庞德雷沃认为，做托诺邦盖生意“这绝对诚实——这是公平的买卖”（Wells, 2002, p. 143）。庞德雷沃脑子里的“理性”就是英国社会制度允许他销售假药，鼓励他销售假药，欢迎他销售假药，那么除非他自己是个傻子，否则他为什么不销售假药呢？庞德雷沃认为销售假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并由衷地感慨：

这是一个大世界，为每个伸手抓财富的人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成功的大门向利爪敞开——呃？托诺邦盖。（Wells, 2002, p. 285）

庞德雷沃自由意志的产生、理性的丧失、非理性意志的形成都离不开当时的伦理环境，而这恰恰证明了这个伦理环境和伦理秩序的不正常。威尔斯在《托诺邦盖》中多次以“癌症”、“肿瘤”来形容英国社会，表明英国社会陷入不治之症。病态的社会伦理孕育了庞德雷沃的非理性，而他非理性行为又反过来加重社会伦理的病态发展，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庞德雷沃的无理性不是英国社会痼疾的解药，而是毒药。也许千千万万个庞德雷沃最终会将英国社会送到死亡和毁灭的边缘。

二、假药：乔治的假理性

与庞德雷沃的无理性相比，乔治的理性表现得复杂多变，在其非理性意志形成之前也曾不同程度地起到过约束作用，但乔治的理性十分不稳定，总体表现为一种假理性的状态。理性的最高层次是人们对善恶的认知，乔治的理性意识在早期还是达到过最高层次的。乔治出身贫寒，经历过英国阶级社会的人情冷暖，年幼时就明白偷窃是犯罪。当他第一次听到托诺邦盖的配方时，他曾义愤填膺地表示：“这是一种该死的骗局”（Wells, 2002, p. 143）。这时的乔治是具有理性的善恶判断的。作为一名心怀抱负的年轻人，乔治本来可以在追寻科学的道路上愈行愈远，然而当他离开布莱茨欧弗山庄来到伦敦之后，纸醉金迷的自由世界逐渐侵蚀了他的理性意识。渐行渐远的理性最终驱使乔治做出了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在科技的加持下他的非理性意志愈演愈烈。乔治的理性像假药一样，或许起初有些疗效，但对于英国社会病态的伦理制度来说，他的不确定的理性无疑已是杯水车薪，回天乏术。

乔治原本是一个理性意识强烈的年轻人。当庞德雷沃向乔治介绍垄断药品奎宁可以发财时，乔治认为这种行为“只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胡闹，在现实生活中谁也不许这么干”（Wells, 2002, p. 73），这是违法行为，如果“谁企图做这种事，谁就必定要进大牢”（Wells, 2002, p. 73）。乔治的理性使他坚决不与庞德雷沃为伍，他认为依靠垄断药品获利是一种不义之举，理应受到法律制裁，反映出乔治的理性已经达到最高层次的道德范畴，能够做出趋于伦理道德的认识和判断。此外，他的理性也渗透在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上面。他说：“我不想只是活下去，或者只是活得快乐，活得舒适，我想怀着某种雄心壮志去奉献，去做事，去创造。”（Wells, 2002, p. 109）乔治认为自己的人生应该过得有意义，而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献和创造。奉献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为他人乃至全人类创造幸福的生活。显然此时乔治的理性意识已经提升到为别人奉献甚至牺牲自己的高度上。

在如此崇高的理性意识指引下，他来到伦敦求学。然而，他的理性不断受到来自现实环境的戕害。刚到伦敦时，乔治就“品尝到自由的滋味，体会到不负责任的轻松和各种新的力量共同产生的牵引力，我的自律就像一件外套从身上滑落了下来。”（Wells, 2002, p. 110）此前他那些有错必纠的理性意识在现实面前碎成齑粉。现实的伦理秩序告诉乔治：做错事不会受到惩罚，人们享有无限的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无需自律。没有底线的自由诱惑乔治的理性意识不断妥协和降低。各种新的力量诱惑他要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活。在学校他对玛丽恩一见倾心，获得美丽的玛丽恩的爱，成为他生活的目标。然而乔治真挚而热烈的爱在玛丽恩眼中却是不“切合实际”的（Wells, 2002, p. 152），玛丽恩的拒绝使乔治彻底怀疑自己原先奉为圭臬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判断。

玛丽恩来到大学校园的初衷是要凭借美丽的皮囊钓得一位金龟婿，她需要腰缠万贯的男朋友，这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才是“切合实际”的。乔治虽然一往情深，但一文不名，即使成绩再出色也换不来财富，因此乔治的爱是“不切合实际”的。乔治的自由意志被现实狠狠地碾压，他开始质疑

先前那些为别人而活的想法多么“不切合实际”。他决定要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活，只有让自由意志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才算活得精彩。乔治的理性意识在慢慢侵蚀和退化，最终退化到最低层次。运用“自由”的手段赚钱，娶到心上人，这就是他最终的理性判断，至于做法是否道德，他早已不去理会。狂热的自由意志遇到最低层次的理性注定会演化成一系列的非理性意志，引导乔治步入歧途，一步步滑向未知的深渊。

乔治的非理性意志首先表现在他与庞德雷沃叔叔一同兜售假药托诺邦盖。起初仅仅为了迎娶玛丽恩的筹码，他决定加入制售假药的行列。后来他主动利用自己学到的科技研制了一种自动装箱工具，实现了标签粘贴自动化。这样能迅速提高假药产量，获得更客观的收益。残酷的现实伦理环境教会乔治：没有钱就娶不到心爱的姑娘，不道德的方式最容易赚到钱，这个社会在意的贫与富，而不会在意善与恶。渐渐的，乔治的理性已经退化到庞德雷沃的无理性状态了。乔治比庞德雷沃对社会潜在的危害性更大，因为他掌握了科技。在非理性意志的驱使下，乔治不仅违背了自己学习科学的初心，还妄图利用科学满足自己的自由意志。

乔治的非理性意志其次表现在他去非洲偷窃考普（一种矿物），并轻松杀害当地岛民。与青梅竹马的比阿特丽丝重逢后，乔治重新对她展开追求，然而迎娶比阿特丽丝并非易事，他需要在婚前获得一个封号，这样才能门当户对。为了封号，他决定铤而走险去盗窃考普。盗窃考普是“国际侵略”（Wells, 2002, p. 343），是一种法律明文规定的违法行为，但风险越大，收益越大。尽管违法，乔治还是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他“……一生最野的冒险中去”（Wells, 2002, p. 345）。在莫尔戴特岛偷窃考普时，被一位岛民无意中撞见，为了杀人灭口，乔治不假思索地开枪射杀了岛民。乔治望着他射出的“……子弹在他的肩胛骨中间开了花，看见这种景象真是由衷地欢喜雀跃”（Wells, 2002, p. 371）。乔治杀人，没有恐惧、懊悔、自责，而是兴奋、喜悦、胜利，他感觉：“心里直纳闷儿，感到万分惊异”（Wells, 2002, p. 371）。为了避免惹祸上身，抹去犯罪现场与自己有关的痕迹，乔治在杀人现场“东瞅瞅、西看看，就像一个人在旅馆寝室里打点行李那样”自在、决绝（Wells, 2002, p. 372）。

如此毫无人性的言行令人唏嘘。此时的乔治很难让读者联想到那个上大学之前的乔治，那个意气风发、忧国忧民的乔治。究竟是什么阉割了乔治的理性？是什么屠杀了那个有理性、有道德的乔治？乔治的理性意识为何如此轻易地被抹去？究其原因，乔治所处的伦理环境难辞其咎，这要从乔治幼年时期所处的伦理环境谈起。

乔治自幼生长在布莱茨欧弗山庄，他从小就体会到等级制度的森严。人人都有一种身份，这种身份是与生俱来的，有等级的，是每个人一生都永远无法摆脱的标签。这种身份就是伦理身份，伦理身份代表着伦理秩序对个体行为的规约。乔治是仆人的儿子，打了主人的儿子就是天大的错误，就要受到惩罚。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就像苛刻的伦理规约一样，在乔治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一颗种子：尊卑有序，不可逾越，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无论乔治是否认可这种伦理秩序，乔治都必须遵守。在这种等级森严、奖罚分明的伦理环境中，乔治的理性意识渐渐萌芽和发展。

后来乔治离开布莱茨欧弗山庄前往伦敦求学，他发现伦敦的伦理环境与布莱茨欧弗山庄的伦理环境迥然不同。伦敦没有森严的身份标签，没有伦理的规约，甚至没有法律的惩治。这时乔治确信自己在布莱茨欧弗山庄获得的那些理性意识已经过时、无效。他原本强烈的理性认知和善恶判断在无底线自由的伦理环境中慢慢褪去颜色，失去影响力。玛丽恩的出现让他突然发现纯粹的爱情在现实

的物质世界里那么不堪一击。原来现实的伦理环境不需要他考虑伦理道德，只需要判断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自由意志即可。乔治的理性已经退化为实现自由意志的助推器。再后来他干脆利落地杀死岛民，他不仅丧失了理性，也丧失了人性。乔治从理性到无理性再到无人性的退变，正是当时畸形的伦理环境和伦理秩序的直接作用和影响。

乔治的理性是善变的、脆弱的。虽然乔治在幼年的伦理环境中习得和培养的理性意识达到最高层次，但随着后来伦理环境的变化，他的理性意识也发生本质的改变，由自律到无律，由道德到无德，由为人到为己，由有人性到无人性，由遵从伦理制度到违背法律制度。人是伦理环境中的人，理性是伦理环境的产物，乔治的理性意识退化与消失是伦理环境造成的。当时伦理环境的疯狂吞噬了乔治的理性意识，剥夺了他的人性，而他的非理性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伦理秩序的混乱和堕落。虽然后来随着叔叔破产和死亡，乔治的理性意识有所恢复，但他善变的理性对于生病的英国伦理制度来说，无疑是一副假药。

三、良药：人类理性的重构

小说中的托诺邦盖是一种假药，却被钻营市场规律的庞德雷沃靠着天花乱坠的广告包装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混乱无序的伦理环境催生出违背伦理道德的商业欺骗行为，而这种行为几乎渗透到每一个富人的发迹史中。英国社会中毒了，如何才能医好英国社会的病躯呢？遗憾的是，我们并未从威尔斯塑造的两位主人公身上找到解药。庞德雷沃的无理性以及他践踏伦理道德的行为对病态的伦理制度来说如同一剂毒药；乔治善变的理性以及他逾越法律制度的行为对病态的伦理制度来说宛如一剂假药。那么治疗英国社会的良药是什么呢？这也是作者苦苦追问的问题。

威尔斯通过小说描绘了一张资本社会的病态伦理关系网。庞德雷沃说：“你说说现在哪一种买卖不需要——夸张。这就是现代手法！人人理解——一个个赞同”（Wells, 2002, p. 144）。资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就是相互欺骗，相互坑害，只要能创造价值和利益，哪怕是危及生命的假药也是好生意。庞德雷沃描绘出资本社会的畸形运转模式：“……承认托诺邦盖对世界的贡献也许不如鸡内金树皮的发现那样伟大，可是关键在于，乔治——它是做买卖！世界就是靠买卖生存的。商业！商品和财物的一种传奇式的交换。”（Wells, 2002, p. 144）在此，商品的品质高低无所谓，只要它能给资本带来巨额收益，就是好的商品。而最好的商品就是用最低的资本投入创造最高的资本回报。资本社会就是依靠这种运营手段和资本运作而发展下去的。

庞德雷沃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倚靠雄厚的财力跻身上流社会，成为财富权力圈的新贵。更为荒谬的是，很多政治家、资本家和大主教不仅从未谴责庞德雷沃的不道德行为，还盘算着把庞德雷沃纳入他们的财阀政治体制内，让他财富惠及他们。政治家、资本家和大主教是资本社会中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道德伦理秩序的代表，他们甚至可以掌握和干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方面的决策。而这些核心人物对庞德雷沃的非理性行为的接受和推崇，说明资本社会的顽疾来源于制度本身的绝症，制度孳乳顽疾，顽疾加速制度死亡。

小说中乔治的老同学尤尔特是这个不可救药的资本社会中少见的社会主义者，他对资本社会的非理性行为产生了深刻的质疑，并清楚地意识到资本社会未来的悲惨结局。尤尔特对乔治说：“说到底，所有这些该死的糊涂都可以改变。如果你能让人们同心协力来干的话”（Wells, 2002, p. 118）。尤尔特对人们的“糊涂”麻木和得过且过感到愤恨，号召大家应该“同心协力”团结起来反抗并推翻

这个病态的制度体系。然而尤尔特又是矛盾的，他的斗争是不彻底的，“他尽管以轻易而巧妙的方法揭露了邪恶，但他根本不想对它们进行改造和革除”（Wells, 2002, p. 120）。显然，“尤尔特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Wells, 2002, p. 149）。尤尔特是个行动上的矮子，但他却是个十足的思想上的巨人，他似乎指明了人类未来前进的方向，或许这也是威尔斯对社会柔性改良愿望的隐晦表达。

伦理关系即生产关系，一定社会的伦理制度和道德标准服务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资本社会看似荒谬的道德伦理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粉饰资产阶级的权利统治，掩盖资产阶级的盘剥。资本社会中的伦理道德秩序带有极大的诱导性和欺骗性，不允许出现维护社会权利公平的道德伦理体系存在。只有消除阶级差别，代表普遍利益而非特定阶级利益的趋于理性的道德伦理秩序才能构建起来。只有构建和完善趋于理性和善性的道德伦理秩序，才是医治病入膏肓的英国伦理的良药。

在《托诺邦盖》中，威尔斯没有塑造任何能够领导大众建立理性伦理的人物。也许他也不知道社会未来的马车该由谁来驾驶、该往何处行驶，然而他在小说结尾处也为人类未来带来一丝光亮：

“我也怀有一线希望，然而那是一种渺茫的希望，一种发现这个帝国或者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大事都没有前途的希望。这些大事将来在历史上是怎么一种景况，我不得而知。”（Wells, 2002, p. 427）虽然威尔斯对人类的未来充满忧思，但他似乎找到了医治资本社会病灶的良药，即人类社会需要构建的理性伦理价值体系和伦理秩序。

四、结语

威尔斯在《托诺邦盖》中“描述了导致 20 世纪大众社会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Hubble, 2010, p. 69）。在社会变革的动荡中，庞德雷沃因为他的无理性而最终走向毁灭。乔治因他的理性随着伦理环境变化而逐渐瓦解，最终落得一败涂地的下场。“托诺邦盖”作为整篇小说的主线，不仅指代一种假药，更象征英国社会痼疾的无药可救。正如聂珍钊（2010）所说：“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p. 17）通过《托诺邦盖》，我们看到了一位悲天悯人的作家身陷病态伦理的囹圄，上下求索而不得其法的无力和无奈，也管窥了他穷其一生为人类未来寻找解药时所经历的“拒绝毒药、防范假药、寻求良药”的心路历程。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丹尼尔·贝尔 (1989):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 蒲隆, 任晓晋译。三联出版社。

[Bell, D. (1989).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Y. Zhao, L. Pu, & X. Re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2002): 《托诺邦盖》，蒲隆译。外国文学出版社。

[Wells, H. G. (2002). *Tono-Bungay*, translated by L. Pu.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侯维瑞 (1986): 《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Hou Weirui (1986). *Survey of Modern British Fic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胡强 (2015): 《伦理秩序与道德责任: 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小说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Hu Qiang (2015). *Ethical Order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A Study of British Social Novels in the Edwardian Er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刘赛雄、胡强 (2017): “‘有机体的腐朽’:《托诺-邦盖》中的精神共同体命运”, 《求索》(6): 168-172.

[Liu Saixiong, Hu Qiang (2017). “‘The Decay of Organism’: The Fate of Spiritual Community in *Tono-Bungay*”. *Seeker* (6): 168-172.]

聂珍钊 (2010):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1): 12-22.

[Nie Zhenzhao (2010).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12-22.]

聂珍钊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Nie Zhenzhao (2014).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史锦秀 (2007): 《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

[Shi Jinxiu (2007). *Aitmatov in China*.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王守仁 (2006): 《英国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Wang Shouren (2006). *A Concis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詹姆斯·冈恩 (2008): 《钻石透镜: 从吉尔伽美什到威尔斯》, 郭建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Gunn, J. (2008). *The Diamond Lens: From Gilgamesh to Wells*, translated by J. Guo.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en, W. (1958). *The English Novel*. Penguin Books.

Ford, M. F. (1965). *Letters of Ford Madox Ford*. In R. Ludwig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ubble, N. (2010). “A Music Hall Double Act: Fordie and Wells's English Review”. In J. Harding (Ed.), *Ford Madox Ford, Modernist Magazines and Editing* (pp. 67-79). Brill.

Lawrence, D. H. (1962).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In H. T. Moore (Ed.). The Viking Press.

Lodge, D. (1970). *Language of Fiction: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Verbal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Novel*. Routledge & Kegan Paul.

Masterman, C. F. G. (1960).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Methuen & Co.